

南帆 著

隱蔽

的

成規



YINBI DE CHENGGUI

福建教育出版社

南帆 著

隐蔽的成规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蔽的成规/南帆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9. 8
ISBN 7-5334-2863-3

I. 隐… II. 南… III. 文学理论-研究 IV. 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35145 号

隐蔽的成规

南帆 著

*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巷 27 号 邮编: 350001)

三明市日报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新市南路 166 号 邮编: 365000)

*

850×1168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45 千字 5 插页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

ISBN 7-5334-2863-3/I·173 定价: 20.3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言	语言的内部与外部	1
第一章	文学史、经典与现代性	6
第二章	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资源	41
第三章	性格与典型	73
第四章	长篇小说与历史叙事	100
第五章	诗与国家神话	132
第六章	批评与意义再生产	160
第七章	传统与文学传统	191
第八章	民间的意义	223
第九章	边缘的声音	254
第十章	电子时代的文学	294

引言 语言的内部与外部

这部著作力图描述和阐释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当然，某些时刻，这样的描述和阐释必须上溯 20 世纪之初，甚至更早一些。罗兰·巴特曾经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历史的叙述愈是接近自己的时代，话语行为的压力愈大，历史时间的移动愈缓慢。^①这时，历史的叙述逐渐陷入密集的资料，步履蹒跚；这些资料的真伪一目了然，编年史式的时间序号排列不再说明什么——如果没有一个尖锐的主题浮现，描述和阐释似乎只能沉没于名著汇编之中。

的确，叙述古代历史的时候，资料的考辨与时间序号的确认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修复某种事物历史面目的常规手段，同时还秘密地认定了“起源”的时间和情节。如同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这篇著名论文之中所说

^① 罗兰·巴特《历史的话语》，见《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51 页。

的那样，“起源”故事的认定时常隐含了事物“本质”的认定：“我们往往以为，当事物令人眼花缭乱地从造物主手中或者从创业第一天清晨那毫无阴影的光芒中出现时，这才是它最伟大、最完美的时刻。”因此，“追求起源是这样一种努力，它试图捕获事物的精确本质、事物最纯粹的可能性以及事物被精心保护的同一性；也因为这种追寻假定在这个充满偶然事件和不断演替的外部世界之前就存在一些不变的形式。”^①可是，临近自己的时代，历史资料的丰富和廉价却导致了这种魅力的丧失。许多资料的真实性已经无足轻重，它们似乎不再完整地闪烁事物的“本质”。历史资料与历史“本质”不再重合，历史的阐释骤然复杂起来。这样的阐释渐渐类似于福柯从尼采那里提炼出的系谱学：试图从众多历史资料的互相关系之中发现某种可信的基本秩序。这时，形而上学的“本质”概念成为空中楼阁，具体的历史存在于多重合力的交汇之处。恩格斯表述过这样的思想，福柯也表述过。^②

于是，这部著作力图描述和阐释的是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史内部隐藏的种种成规。这些成规来自一系列有力地插入文学的文化因素，诸如现代性、文学观念、典型、历史叙事、国家神话、意义生产机制、传统、民间的概念、美学力比多、电子传播媒介，如此等等。这些文化因素经历了某种奇特的美学转换之后分别进入了文类、风格、修辞、叙事话语、意象等文学话语范畴。这些

① 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见《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可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 年 9 月 21～22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78 至 479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同时可参见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成规编织为半个世纪文学史的框架结构，决定文学史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运行：一些成规联合制造了文学史的某种可能，一些成规封锁了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考察这些成规的复杂分布，犹如考察文学史的骨骼、内脏、脉络和神经。

文学在源源不断地生产。殚精竭虑的构思，天才的想像，汹涌的灵感，美妙的遣词造句，成规隐藏在文学的深部，如同重力一样制约了作家飞翔的高度。一些成规曾经浮出地表，并且带来激烈的冲突和争辩；另一些成规甚至没有被察觉，所有的制约仿佛都是理所当然的前提。于是，描述和阐释这些成规首先是解除“理所当然”的理论麻痹，揭示这些成规的隐蔽位置。无论是肯定这些成规、质疑这些成规还是挑战这些成规，人们必须意识到这些成规的坚硬存在。

这部著作无法面面俱到。这并不奇怪，所有的描述和阐释都同时包含了拒绝的机制。放弃某些部分也就是聚焦另一些部分。事实上，人们的疑问可能指向的是，这部著作引进了某些文学之外的内容，例如现代性的辩论，历史叙事或者国家神话，大众传播媒介以及科学意识形态，等等。这还是“文学”的分析吗？这些资料的介入是否会损害文学学科的纯洁无瑕？这里涉及到学科与问题的关系。多数学科的设置可以追溯久远的传统渊源，中国的文学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学科逻辑的延续性时常支配了现有的学科研究范式。可是，某些问题——尤其是某些复杂的问题——的形成超出了既定的学科边界，居于跨学科的交叉地带，盘根错节。这个意义上，人们没有理由让学科的陈旧版图肢解完整的问题。学科的版图并不是一个无可置疑的权威。这些版图同

样是历史的产物，并且时时根据历史环境重新绘制。^①很大程度上，文化研究的兴盛打破了各个学科分疆而治的限制。所以，弗·詹姆逊说，他无所谓文化研究是否再度成为一个标准的学科：“它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②

这还是“文学”的分析吗？——这样的疑问具有深刻的原因。文学批评史上，文学曾经被视为社会学文献，视为作家心理症状的病历卡，或者视为哲学思想的例证。人们无法从这里发现文学之为文学的说明。20世纪以来，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均对这样的文学研究提出了强烈的异议。这些批评学派不约而同地将焦点转向了文学的语言，“内部研究”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文化研究是不是重返“外部研究”？回答既否定又肯定。在我看来，文化研究没有理由省略文学的语言层面，单纯地将文学想像为再现现实的一面客观而公允的镜子。事实上，种种文学问题的提出必须包含了文学语言的考察，或者说，文学语言的考察表明了这些问题的确是“文学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种种文学问题的解决仅仅回旋于文学语言内部。人们没有理由狭隘地将文学语言的考察想像为挤柠檬式的字、词、句辨析。许多时候，文学语言的隐喻、反讽、叙事特征、文类的演变与历史语境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文学语言的美学意义只能书写于特定的历史语境

① 这个问题可参见华勒斯坦等著的《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② 弗·詹姆逊《论“文化研究”》，见《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之内——文学的先锋意义或者文学的美学反抗无一不是以某种历史文化的概况作为衡量的基准。这个意义上，巴赫金的观点富于启示。巴赫金承认语言相对自主的内部逻辑，但是，语言同时还卷入社会关系，卷入政治系统、意识形态系统和经济系统。^①种种“卷入”恰恰是文学史上一个又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这即是文学语言与种种成规的相互遭遇。如何描述与阐释文学史内部种种隐蔽的成规？这部著作再三地徘徊、往返于历史与语言之间。这样的描述和阐释分门别类地展开的时候，这部著作返回了我所习惯的文体：既是叙述，又是分析；既是历史回忆，又是理论思辨——也许，对于这部著作说来，叙述与分析、历史回忆与理论思辨之间的距离并不如想像的那么大。

^① 参见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同时参见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第一章 文学史、经典与现代性

形式纷繁的文学史已经组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这个体系通常被视为文学学科的重要基石。许多人对于文学史具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文学史意味了某种坚硬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描述，这样的描述避免了种种时尚趣味的干扰而成为一种可以信赖的知识。他们心目中，文学史是文学知识的集大成；因此，文学史甚至如同某种有效的证书：文学史的写作标志了一个成熟的学术阶段——标志写作者业已可能纵论和总结一个学科积累的全部资料。目前为止，多数文学史著作力图追求的基本特征——清晰、实证与知识的专门化——显然与既定的教学体制相互呼应。“中国文学”的学科框架内部，文学史无疑是一门“显学”。据考，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于1910年公开出版；80余年之后，面世的

中国文学史已经近 900 部。^①这个惊人的数字表明，文学史的写作隐含了非凡的吸引力。

如同韦勒克曾经观察到的那样，文学学科通常包含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许多时候，三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争夺学科盟主的位置。^②许多人已经看到，三者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楚河汉界；种种混杂与交叉不时可见。或许可以说，愈逼近某些重要的个案研究，三者之间的界限愈模糊。这个意义上，人们有理由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文学史更多地赢得了人们的器重？

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不仅意味了一批举世瞩目的发明和创造，同时，这种成功还确立了一种标准的研究范式，一种通用的知识尺度。文学研究无法像自然科学一样坚实、规范与无可争辩，这始终是一个难言的心病。尽管文学史仍然某种程度地服从于个人趣味，但是，它似乎已经是文学研究之中最为“客观”、同时也是最为权威的知识。考虑到这种观念的形成，我想提到一个著名的话语策略——历史化。文学史的“历史化”表明，某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学事实将会得到历史话语重新叙述。这产生了什么后果？

人们的想像之中，文学史是一种历史性的清理。人们将退出

① 据黄山书社 1986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陈玉堂编）统计，1949 年之前的各种文学史著作已经有 300 余种；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吉平平、黄晓静编）统计，1949 年至 1991 年出版的各类文学史著作多达 578 部。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为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参见《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钟林斌《序》。

② 参见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见《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

参与者的角色，换取一个历史观察者的立场。的确，时间的间距为人们的观察提供了更为宏大的背景，一系列的衡量与定位拥有了更多的参照坐标。另一方面，文学史的论断承担了更大的责任。文学史意味着，人们试图选择哪些文学个案——哪些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文学事件——充任文学知识的范例，维持文学学科的框架与规模，并且解释这个历史时期文学话语的功能。话语生产的分类之中，王瑶曾经指认了文学史的归宿：文学史从属于历史话语。^①这样的类别归宿表明，文学史分享了“历史”这个概念的特殊份量。历史是什么？《说文解字》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如实的记叙是历史话语的基本职能，同时是历史话语的威信所在。人们业已习惯了这样的传统：历史的记事必须保持“客观”与“中性”的信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样的信誉是人们征引历史话语的依据。从儒家典籍的一系列言论到崇尚实证的科学精神，“真实”始终是历史话语的不懈指向。这甚至制定了标准的历史话语修辞。通常，历史叙述使用第三人称，个人的趣味与抒情语言没有理由修改既定的事实；诚如巴特所发现的那样，历史话语取消了目的记号；历史学家试图让读者觉得，所指物正在自言自语：“作者企图通过故意省略对作品创作者的任何直接暗示，以避免他本人的话语的地方，历史似乎在自行写作。这一方法被极为广泛地运用着，因为它适合历史话语的所谓‘客观的’方式，而历史学家本身则从不在这种方式中出现。实际的情况是，作者放弃了人性的人物，而代之以一个‘客观的’人

① 《王瑶文集》第5卷《后记》，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物；作者的主体依然明显，但他变成了一个客观的主体。”^①

然而，许多场合，“真实”赢得的是不可比拟的意识形态效果。“真实”无形地暗示了某种期待：因为“真实”表明了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那么，现实乃至未来仍将是这种“真实”的逻辑延续。这里，实证主义与预测未来产生了奇异的同谋。没有人否认，历史话语来自个人的写作；但是，历史叙述形式保存了这样的幻觉：这里的个人观点已经转变为某种“客观”的发现。许多思想家时常产生书写一部历史的宏愿。这某种程度地意味着，他企图让个人的独特观点取得历史叙述的形式。

“真实”是判断的依据，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常识。可是，经历过一系列话语分析之后，人们终于察觉到历史叙述内部的意识形态信息——这里的真实与判断常常合二而一。如果将历史叙述想像为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那就过于幼稚了。“客观”与“中性”的表象背后，历史叙述的价值尺度无所不在。历史话语不是僵死的档案。历史叙述不仅包含了过往的事实，同时还包含了这些事实的意义。意义的认定是历史叙述从来不愿意放弃的权力。更为彻底地说，历史叙述之中的“事实”与“意义”不可分割。事实必须引入意义才能存在。通常的邂逅或者聚谈并不是历史事实；只有当这些邂逅或者聚谈策划出某一个意义重大的文学事件之后，它们才可能成为文学史的素材。换言之，意义的导航划定了事实的起讫边界和演变线索。所以，海登·怀特说：“在历史话语中呈现出的事实之存在及存在的方式是为了对该陈述有意支持的那个阐述给予肯定。此一阐述的说服力来自事实在

^① 巴特《历史的话语》，见《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1页。

话语中被表述时所依照的那种次序和方式。历史话语本身实际上是事实与意义的结合体。”^① 巴特甚至封锁了退出意义的所有后路：“从‘客观性的’话语中删除意义，只不过又产生一种新的意义；我们再次断言：系统中一个成分的不存在正与它的存在同样是有意义的。”^②

事实意义的认定时常是历史话语进入现实的中介。历史话语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将事实意义的认定转换为现实之中的某种价值规范。孟子阐述了孔子写作《春秋》的动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③ 司马迁认为，《春秋》可以“当一王之法”：“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④ 这样的转换力图证明，某些演变遵循了必然的规律；某些迹象预兆了社稷的颓败——这一切喻示了历史话语介入现实的强烈形式。事实上，历史话语从来没有撤出现实之外。中国的史官文化表明，历史的书写是古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史官曾经是一个显赫的职位，兼管祭神占卜。修史具有很强的官方性质。历史话语时常卷入政治话语，徘徊于宫廷与监狱之间。即使在历史学成为自律的学科之后，“独立”仍被视为历史话语与政

① 海登·怀特《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像》，《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② 巴特《历史的话语》，见《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1页。

③ 《孟子·滕文公下》。

④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治话语相互抗衡的资本。如同华勒斯坦所说的那样，“科学”的名义为这样的独立赋予某种现实权力^①——尽管许多人是从责任而不是从统治或者获利的意义上索取这种权力。这时人们可以说，历史记录了过往的事件，但历史话语始终置于现实之中。

这样，人们对于文学史的考察相对地复杂起来。文学史并非仅仅是陈旧的文学资料辑录；保存和收集同时是这些文学资料的解释。文学史将在一系列逝去的文学事实之中发现种种母题，考察文学类型与文学形式的演变，概括某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主题，提出某种文学传统的存在。不言而喻，解释通常是争讼的开始。文学史之所以始终是激烈争讼的漩涡，很大程度上因为事实意义的不同认定。的确，如果某种事实意义的解释袭用了历史叙述的形式，这亦即袭用了不同寻常的威信。这个意义上，人们有必要竭力让自己的文学观点赢得载入历史的资格。套用福柯的观念，文学史同样是知识与权力联盟的某种形式。无形之中，文学史的写作隐含了某种主宰文学现实的渴求。定是非，立规矩，激浊扬清，臧否作家——这一切都将寄寓在古香古色的历史叙述之中。韦勒克已经发现，历史叙述仿佛具有某种纳入正统的意味；文学史阐明某种文学的“进化”也就是肯定这个历程体现的某种价值，尽管这里可能存在一个迫不得已的循环——“历史的过程得由价值来判断，而价值本身却又是从历史中取得的。”^②显而易见，这样的循环企图将文学的发展导入历史设定的范式。所以，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之中反复强调了历史在现实之中的重量：“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

① 参见《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页。

② 韦勒克、沃伦《文学原理》，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96页。

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①

于是，人们终于在文学史的知识汇集——诸如作家的籍贯与生卒年，作品的篇名与版本，某些文学社团的成员人数，某些文学派别的渊源——背后发现一个文学话语的控制系统。这个系统不仅提供种种文学生产的范本；更高的意义上，这个系统负责向人们宣谕文学是什么。通常，一个社会拥有两种文学的来源：当代作家的写作与文学史存留的经典之作。目前为止，文学社会学还没有出示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显明，当代作家的写作与经典之作分别在通常的文学阅读之中占据何种比例。然而，这样的猜测可能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尽管多数人更乐于阅读当代作家的作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承认，经典之作更具权威性。文学史无疑是经典之作的鉴定，许多人无条件地信任文学史公布的经典书目。诚然，文学史的写作包含了种种作品的挑选、争议、权衡，然而，这个复杂的辨识过程消失在人们的视域之外。没有多少人愿意继续翻阅庞杂的原始资料，重新甄别和披沙拣金；人们相信，历史话语的信誉已经承担了一切——那张熠熠生辉的书目同时是一份无可挑剔的鉴定书。如果人们只能凭借这张书目想像文学，那么，文学史的介绍——无论洞见还是短视便构成了人们进入文学的唯一闸门。

文学史如何行使现实的权力？文学史如何将某些文学知识固定下来，使之成为恒定的范式不断承传？这时，人们有理由考察经典的形成及其效果。通常，种种价值尺度是抽象的，空洞的，教

^① 参见《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条的；经典的出现终于使这些尺度的论述拥有某种网结点和可感可触的样榜。

二

如同政治史时常存在一个帝王体系一样，文学史通常存在一个经典体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史的叙述即是将一系列的经典连缀为一个体系。这样的体系包括一批作品篇目，包括这些作品的成就判断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历史上曾经问世的作品不计其数，人们只能望洋兴叹；这时，经典体系可能被想像为一张历史性的导航图，重重叠叠的出版物化约为寥寥几部。然而，如果考虑到经典体系通常被称之为社会文化的宝藏，如果考虑到经典体系的形成包含了主流文化的审核与确认，那么，人们就不会仅仅将删繁就简视为经典体系的首要功能。事实上，经典体系的代表性来自作品背后某种不断承传的价值规范。

“经”的本义为织物的纵线。从编织的经纬引申至经天纬地的宏大涵义，这即是人们赋予经典的地位。经典的崇拜试图表明，这些著作之中寓有某种不可移易的终极真理。所以，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经》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样的意义上，经典的认定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权力——经典的认定与某种公理的确立密不可分。许多时候，个人无法独享这样的权力；经典的最终确认是一个文学制度共同运作的结果。这即是说，经典不仅来自某些个人超凡的阅读趣味，同时，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均属制造经典的一系列环节。按照斯蒂文·托托西的观点，“文学制度”由一些参与经典选拔的机构组成，“包括教育、大学师资、文学批评、学术圈、自由科学、核心刊物编辑、作家协会、